

学术专论

从“辽燕旧界”到“华夷大界” ——朝鲜人笔下的山海关意象

黄普基

【摘要】明朝时期，朝鲜人并无以山海关为界、关内外华夷不同的“分界”概念。但明清易代，政治局面的巨变促使朝鲜人大大地强化了华夷分界的意识，以致最终认定山海关为明晰的“界线”。具体而言，清时期朝鲜人对关内的种种自然、人文景观往往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宽容和肯定；相反，对关外却持着过于苛刻的否定态度。然而，有趣的是，清时期朝鲜人对关内外分界意识逐渐强化之时，两地的文化差距实际上却在日益缩小。而且，关内永平府与关外辽西之间，其相似性甚至大于差异性。

【关键词】山海关 华夷思想 朝鲜使者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2)-04-0028-09

**From “the Boundary Between Liao and Yan” to “the Boundary Between Hua and Yi”:
Shanhaiguan as Described by Korea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ncept that Shanhaiguan was the boundary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did not exist at all among Korean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the concept was greatly strengthened but great political change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Koreans was surprisingly tolerant and positive towards the natural and humane landscape inside the Pass, but was overly severe and negative towards the landscape outside the Pass in the Qing Dynasty. Interestingly, the cultural distinction between inside the Pass and outside the Pass was reduced day by day while the boundary conception was gradually being strengthened in the Qing Dynasty, even though the resemblance was more tha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side the Pass and outside the Pass.

山海关，因其北倚燕山，南连渤海而得名。背山临海的地理条件，赋予山海关几项重要的功能和意义。首先，山海关是天然要塞，是华北平原和辽西走廊之间一条重要的通道；而同时，它也是一种观念性的界线标志，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这些功能和意义给予明清时期陆陆续续来到中国的朝鲜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因而，他们在其文集中便留下了关于山海关的大量见闻和观感。

其中，有些人吟咏的是山海关的军事要塞功能。山海关是保护帝国首都的最重要的要塞。因此，朝鲜人只要到达山海关，都会发出“信识三京此作喉”^①的赞叹。支撑“作喉”的，就是该地区“山如畔走海来攔，厄塞端宜制战争”^②的优越的地理条件。这里的“喉”有双重含义，一是阻挡，二是连接。正是在这项意义上，对朝鲜人而言，山海关既是“左通辽海，右护京畿门”^③的要塞，更是“北控胡夷，东通王贡”^④的关口。因为山海关是朝鲜人使行路上的必经之路，更是他们接受中原

【收稿日期】2012-06-20

【作者简介】黄普基（1972—），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南京 210093

文化的通道。

除了山海关的军事要塞功能以外，朝鲜人吟咏最多的还有其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即分界功能。分界功能是朝鲜人到山海关时最强烈地感受到的功能，而且他们对此一功能的关注远远大于中朝人。特别是清时期，朝鲜人对山海关的分界意识变得空前强大。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朝鲜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现象。

朝鲜人这一特殊的文化心理隐藏于他们的《燕行录》等使行记录以及《韩国文集》等个人文集中。目前利用《燕行录》等朝鲜人的记录，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区域状况以及朝鲜人的区域意象等文章较为多见，只是其论述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京、江南等政治、文化中心地区，而且其观察时期主要集中在清中后期以后。^⑤

基于此，本文将全面地梳理分析整个明清时期朝鲜人的记录，从而讨论当时朝鲜人心目中的山海关意象和分界意识，并对影响其感知意象的因素加以探讨。

一、朝鲜人的山海关分界意识

在朝鲜人的心目中，山海关作为分界线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最显著的表现是自然地理分界，如“区分内外山为界，横截东南海作池”^⑥。

因为是自然地理分界，也就容易成为行政区划的分界。明时期关内河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是京师或北直隶，关外辽宁地区的行政区划是辽东都司。因此说山海关是“辽东北直隶之一大界限。”^⑦

值得注意的是，明时期的“辽”既是行政概念，又是文化概念。明时期朝鲜人对山海关的最普遍的意象是“辽燕旧界”^⑧。所谓“辽燕旧界”，即主要指文化分界而言。对于河北地域的文化归属，朝鲜人的普遍感觉是“燕”；而辽宁地域则被认为是“辽”。

清时期河北的行政区划名称是“直隶”，但朝鲜人的普遍感觉仍然是“燕”，如“燕路三千树入云”^⑨。有些人则提及“幽州”，如“辽野西南皆渤海，幽州东北尽胡山。”^⑩可知，

明清两代河北地区的行政区划名称“直隶”，基本上不为朝鲜人所使用。

清时期辽宁地区的行政区划名称是“盛京”，或曰“奉天府”。然而朝鲜人提及辽宁，第一反应却仍然是“辽”：如“长城万里辽东界，大笔千年天下关”^⑪；再如山海关城“起于辽东之始也”^⑫。这些都足以说明，明时期该地区的行政概念“辽东”，到清时期已更多地变为文化概念，而且它作为文化概念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其作为行政概念的使用频率。

至于辽宁地区的文化归属名称，还有一个是“东北”。如“东北诸蕃第一关”^⑬，或者“长城外东北边界”^⑭。其实明时期朝鲜人的篇什里使用“东北”的频率并不高，不过清中期以后逐渐多了起来。

有趣的是，朝鲜人的篇什里有“辽东界”，或“东北边界”等说法，却几乎不见“河北界”或“蓟燕界”等说法。这可能与以中原为本位的标准有关，在山海关关门的匾额安排上即有很明显的体现。朝鲜人进入山海关时，分别经过“通辽、华夷、瞻仰”等门^⑮。其中“通辽”一名就有强烈的中原本位意味。当然朝鲜人也认可中原本位的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个匾额“华夷”，这在明时期朝鲜人的地理分界意识中很少出现。其实“山海关门之扁曰：华夷大界”^⑯，这个匾额明时期就一直挂在山海关，然而没有一个朝鲜人拿这个“华夷”来做文章，只有极少人在描述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时使用过它：

山海关当其中，北负山，南带海，相距十余里间，为夷夏要险之地。^⑰

虽然这里有内外华夷的意识存在，然而并没有将其视为“分界”的外在表现。

有些朝鲜人对该地区的建筑物，给予了类似华夷区分的评价。如在角山上建立的“角山寺”被赋予“千年柱”^⑱之称。这里的“千年柱”，应该是交州的马援铜柱。作者虽然不标明“铜柱”之名，但其以该地为疆域之“极边”的意思亦至为明显。过去中原人以铜柱为中华之南界。铜柱并非天然的地理界线，它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因而中原人在言及南疆时往往以此作为标的。有些朝鲜人对山海关的“观海亭”也给予“铜柱”^⑲的评价，然

而几乎没有一个人直接提到“分界”这个词。

这样的华夷分界意识到清时期有了明显的转变。清时期朝鲜人的篇什里开始出现“界”这个字。如，“回眺长城气势雄，群山万迭界华戎。”^②这即是将地理分界转化成了文化分界。支持这一地理界线成立的，是燕山与其上筑成的长城。燕山延续到角山时，其“分界”效果更加明显：

角山，在县城东北一百里，山海关北，山势由居庸、古北、喜峰诸山而东，延亘千余里，至此耸峙如角，长城枕其上，为华夷大界。^①

从“华夷大界”中可看出，朝鲜人对角山与其上的长城赋予了极大的“分界”意义。既然长城和角山是华夷分界，那么山海关成为“华夷分界”即为顺理成章的事了。因而，清时期朝鲜人吟咏山海关时，多出现“夷夏封疆此地分”^②或“曾识华戎界此间”^③之句。此外，山海关最南端的望海亭，也同样得到了华夷分界的地位，如“夷夏封疆曾此郭”^④。

清时期有些朝鲜人还强调长城作为华夷分界的历史之悠久：

瀚海之东雁门北，长虹直跨黄河水。

千年为标华夷界，中国藩篱盖如此。^⑤

更有朝鲜人认为华夷分界不仅仅历史悠久，而且它还是上天的安排，正所谓“天教壤界限华夷”^⑥。

这样一来，清时期山海关和长城不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分界，还成为了文化意义上的边界。

二、当时朝鲜人感受到的 关内外的不同

以上我们看到清时期朝鲜人对山海关的分界意识的膨胀，特别是文化分界。那么清时期朝鲜人所感受到的以山海关为分界的关内外之间的差异具体又如何呢？

首先来看朝鲜人对关内外自然环境的评价。明时期一个朝鲜使者在关外广宁途中已有吟咏“已穷辽左界，渐近古幽州。大野城沈雾，层冰河断流。”^⑦可见他对关外辽东地区的自然环境并无好评，但作者也没有特别的褒贬

之意。

十几天之后，他在关内永平府途中曾吟咏道：

燕山东走如长蛇，行傍长城信马过。

一派青滦明近郭，万株垂柳弄晴沙。^⑧

作者寥寥数笔就将关内的自然面貌勾勒出来了，颇有些诗情画意。这样的笔调，令人感到十分亲切。

再看明时期另一个朝鲜人笔下的辽西平原地区“一有霖雨”，则积水不流，“大为行路之患”。作者点明关外辽西河流的特点，指出了下雨时的行路之难。但在记述中几乎没有注入自己的感情，措辞较客观。^⑨

但到了清时期，朝鲜人的陈述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每当霖潦之时，曲曲阻水，处处泥泞，且有蚊蚋成阵，人不得往来。而至若如此深秋，则仅可以通辽左，所谓罪地也。^⑩

同样是对辽泽的描述，清时期朝鲜人对辽西的地理环境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认为“辽左”是所谓的“罪地”。这是极为情绪化的表述。

相对而言，这位朝鲜人对关内的自然环境却持着相当肯定和赞美的态度：

滦水南流，萦迴庙后，水清沙白，鳧雁囉囉，峰峦秀丽，霜叶烂熳，是必畿东第一江山。^⑪

从以上对比可看出，明时期朝鲜人对关内外的地理环境有着不同的评价，但并没有显露好恶情感。但到了清时期，朝鲜人在评价关内外地理环境的差异时，却注入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对关内的地理环境仍然给予好评，而相对来说对关外的评价更加苛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清时期朝鲜人对辽东地理环境的恶评主要集中在辽左（辽西）一带。

与此相关，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清时期朝鲜人热衷于比较关内外的自然环境：关内风气与关外“迥异”，“山川间多明媚”^⑫；关内风气“绝异”关东，“山川明媚，曲曲堪画”^⑬。类似的评价不绝于书。可见关内的自然环境广受当时朝鲜人的好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关内“山底松林苍茜，中亦有人家”^⑭的

植被状况。这样的环境是与朝鲜较相似的。朝鲜人对其感觉既近，自不免亲。

关内外自然环境的不同，除了前面提到的诸因素外，气候也是朝鲜人热衷于比较的一个话题。清时期的朝贡主要是冬至出使。通常朝鲜使行团是在农历十一月初经过辽西，十二月中旬过山海关，十二月底到达北京。他们回程时是在农历二月中旬经过永平府，二月下旬出山海关，进入辽西。他们是在天气苦寒的时候通过山海关。而清时期朝鲜人对关内、外气候的总体观感是：关外“尺雪尚深”，而关内则“便不见雪”，“风气之悬殊可知”^⑤。可知当时朝鲜人强烈地感受着关内外气候的迥异。更夸张的是，有些朝鲜人感受到的差异，甚至到了“地气殊海陆，天时换阴晴”^⑥的程度。这着实令人惊异。

有些朝鲜人感觉关内外“十步之间，气候绝异”，而其对背后原因的分析竟是“人事有限，地理隔断，天时随之，所谓人众胜天者耶”^⑦。这种与真相悬隔、主观性甚强的说法当然缺乏科学依据，不过为何产生这种想法却值得我们深思。

以上讨论的是朝鲜人在关内外感受到的自然环境的不同。下面再来探讨当时朝鲜人心目中关内外人文环境的不同。

先来看明时期。当时朝鲜人记载山海关以东，其人“皆羸鄙，衣冠蓝缕”，而“性行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风”^⑧。他们对关外人之所以有这么苛刻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认为该地严重胡化“岂其久沦于契丹、女真、蒙古之域，而遂为习俗也耶？”^⑨

而来到关内的朝鲜人，则不约而同地对该地域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民风，表达赞美之意：

民风随处好，游子意如何。种柳通幽径，尝茶唤小娥。幸今烽火少，从古塞云多。薄晚逢樵牧，牛羊各识家。^⑩

上文吟咏的是正德年间（1521）永平府的风景。第一句作者便赞扬该地区“民风随处好”，之后作者勾勒出了该地和平时期的情形。此地大多数朝鲜人的笔下，都是一派欣欣向荣、亲切可爱的人文风光。既然人文风光好，那民风应该也好。通过上述比较，不难看出

出明时期朝鲜人对关内外的人文环境截然不同的评价。

到了清时期，朝鲜人先前的印象仍然没有改变。他们对关外辽东人的评价仍然极差，甚至有了蔑视的情绪：

关内市廛人物之富庶，与盛京相为上下。而男女之立道傍者，眉目皆清秀美丽，颇异于关外“杂种”也。^⑪

该使臣觉得关内人“眉目皆清秀美丽”，而以“杂种”称呼“关外人”，其中的喜憎，一目了然。

而有此评价者，并非只是朝鲜人，中原人也持有这种看法。朝鲜人朴趾源与中朝人田生笔谈：

余曰：自此至京师千五百里，闻人高士，沿路必多。愿得姓名，以便寻访。

田生曰：关外系是边鄙，地气高寒，人士劲武……如我辈人无足道者。^⑫

相对而言，清时期关内地区得到了朝鲜人全面的好评。对朝鲜人来说，好民风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儒家道德。“旌门”即为儒家道德的象征之一：

永平、抚宁、玉田等地山川，极其秀丽，故亦多节孝旌门，可知人杰之地灵也。^⑬

作者对关内自然环境的相当肯定的评价，直接转移到对其人文环境的肯定评价，因而就出现了“地灵”则“人杰”的说法。其实，朝鲜人一直比较相信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关联，换言之，关注“人”与“地”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他们眼中的“风水”。

服装也是风俗好坏之标准，尤其是对朝鲜人来说：

关内清人绝无而仅有，举皆汉人。女人或着折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间间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度，可爱。^⑭

显然，这个女子之所以被认为是“可爱”的，是因为她是汉人；再加上她“带明衣制度”，就更容易得到朝鲜使臣的好评和认同了。

另外，“关内多是汉人”^⑮，也是他们给予关内好评的原因之一。说到“汉人”，这就涉及到种族与礼仪的问题。朝鲜人重视礼仪，因

而非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汉女避人，清女不避人”⁴⁶的习俗。朝鲜人对关内“汉女避人”的习俗颇有好评；相反，对“清女不避人”的习俗有着苛刻的评价。此毋庸赘言。

再者，经济条件也影响朝鲜人对关内外截然不同的评价。康熙年间（1720年），关内“处地雄伟，闾阎富丽，士女都冶，市肆丰侈，又非沈阳之比”⁴⁷。到了清中后期，虽然关外盛京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关内永平府等地，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朝鲜人对关内人的好感。实际上，朝鲜人对关内人的好感一直延续到后来。如道光年间（1832年）的朝鲜使臣即记载关内“闾井甚盛，车马骈阗，士女都冶，雄富埒于盛京”⁴⁸。可看出，“士女都冶”仍然是关内人带给朝鲜人的主要印象。下文可视为朝鲜人亲近关内的典型描述：

西北群山围绕如偃月，风气顿殊。关外野稀青色，关内野树青葱，黍稷盈畴，平如绿茵。往往大村落，灰屋砖墙，隐映于高柳之间。男欣女悦，既庶且富，行者讴谣。⁴⁹

这样如诗如画的场景，简直是中国传统理想中的乐土。值得一提的是，关内自然、人文环境带给朝鲜人的另一个重要的感受是“中原”：

故处处柳木成林，闾家相接，大成村落，渐有中原之态。⁵⁰

一直以来，在朝鲜人心目中，中原就是他们进入山海关之后目睹的一切；只有进入山海关才算进入中土。

综上所述，关内吸引朝鲜人的并不只是山水；朝鲜人盛赞的关内之美，其实是一种结合了自然与人文的综合性感觉。

三、关内外的异中之同

通过上面的分析讨论，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笔下关内外各个方面的不同。那么关内外的差距真有这么大吗？它们真的是两个如此截然不同的空间吗？为讨论这些问题，笔者将更加深入地分析清时期关内外的实际情况，并进一步探讨朝鲜人对于关内外有着如此不同的观感其背后的原因。

当时朝鲜人对于关内外的评价，主要是基

于关内永平府和关外辽西地区的情况。此外，就时间而言，朝鲜人关内、外的分界意识是在清时期才凸显强化的。因此笔者下面将主要比较清时期的辽西地区和关内地区。

首先看地理环境方面。上文中笔者讨论过，清时期朝鲜人对关内地理环境给予好评，而相对来说对关外地理环境的评价则更加苛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他们观察到关内地区良好的植被覆盖情况。但根据《抚宁县志》、《临榆县志》等县志山水图，清时期该地区植被覆盖率其实并不高。该地区远近山区多由石山与不稠密的森林构成；平原地区的植被状况更差，主要植被不过是马路两边排列的杨树而已。朝鲜人经过的永平府一带，降水量大概是700—750毫米左右，雨量并不充足。加之属于畿辅地区的永平府拥有较多的人口，因此其植被覆盖率不可能很高。那么，朝鲜人为什么会对于关内的地理环境有着上述如此美好的描述呢？因为朝鲜使臣到达永平府之前经过的辽河平原西部地区，属于半干旱地区，植被覆盖率也很低，而他们一到永平府，发现与辽河平原西部地区不同的自然景观，自然便会留下上述较多较美好的记载。当然，朝鲜使者对这些自然景观的描述，与实际情况相比，已有夸张的成分。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情况呢？笔者以为，这很可能是感受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即“感觉误差”。

再来看气候方面。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通过一位朝鲜使臣的日记，来考察当时关内外的天气情况。康熙年间（1712年）一个名叫金昌业的朝鲜人“自永平府行，至榆关宿”。当天是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已经进入早春季节。路上风雪交加，“不能开眼”。至吴官营时，“雪深道泥，人马俱困”。傍晚至榆关，而“雪入怀而结须者，皆成冰片，其大如掌”⁵¹。翌日，他从榆关出发，往至山海关，天晴，然“风甚寒”。作者欲往角山寺，而“一行皆以雪后风寒难之”⁵²。下一日（二月二十四日），作者出山海关，进入辽东：

出关门，积雪遍野，西北风极烈，入来时无此寒，咫尺间候顿殊，有若异域，殆所谓天限南北也。⁵³

当天的天气“积雪遍野，西北风极烈”，这样

的天气与廿二日相差无几，然而关外却给朝鲜人“咫尺间候顿殊，有若异域”的感觉！

当天同行的另一个朝鲜人也写道：

关内柳眉初展，关外顿无春意，内外炎凉判异之言，似非虚也。^④

朝鲜人经过关内是二月中旬，过山海关到关外辽西是二月下旬。后一时间点的春意应浓于之前，然而他们却感觉到关外的天气更为寒冷，从而基本认可了“内外炎凉判异之言”。

关于当时朝鲜使臣对关内外气候感受的强烈反差，下面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辽燕，俱是北地，而寒暖如是不同。

天设一带长城，以界华夷，风俗纵云各异，时候何其悬殊也。以海东比之，其暖犹倍可讶。^⑤

作者认为关内的气候“以海东（朝鲜）比之，其暖犹倍可讶”。这是明显夸张的说法。他们经过的关内（更严格地说是冀东地区），纬度比朝鲜高，冬天平均气温比朝鲜更低，不可能会比朝鲜温暖。

以上讨论的是清时期朝鲜人所感受到的关内外不同的自然环境。下面将讨论人文环境的问题。与清时期朝鲜人的感受不同，笔者通过梳理关内外的人文环境的资料发现，关内外之间其实有着较多的相同相似之处。这是因为辽西一带与冀东地区接壤，一直受到关内文化的影响，故而呈现出与关内相似的文化景观。

第一，农耕文化景观。先看农耕法，如堆粪，这是肥沃农田的一种常见方法。此法当时在关内已很普遍；而在关外辽西地区，清时期才开始普及。当地人家“处处堆粪，一堆多至累百车，而无不方正，如中绳尺”，自宁远以后“间间有之”，“近关渐盛，到此尤多”^⑥。

再看果树的种植。关内永平府的果树以枣、梨、桃、栗等最为普遍。《燕行录》也记载道“过山海关行百里（宁远一带），杨柳桑枣之树，茂翳交柯。”^⑦其中枣树在关外只见于辽西一带。辽西一带与关内接壤，因而植被、种植树木也多相似：路傍“尽生酸枣树，至关门皆然”^⑧。

第二，市场圈。朝鲜使臣到宁远时，市集上多见卖橘、葡萄者^⑨。这些都是在永平府市

场上大量出售的水果，而在宁远也能见到不少。辽西一带紧邻永平府，故与永平府形成了同一市场圈。

第三，埋葬文化。清时期“露棺田野”的埋葬文化“关内外无异”：埋葬地选址均不在山地，而是在“田间路左及川边”；坟茔累累，“床碑间有之矣”^⑩。

第四，戏子屋。戏剧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之一。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对戏剧文化产生认同并加以支持，使戏剧文化得以不断发展。清代的戏剧文化，兴盛于康熙、乾隆两朝。当时北京不论是在城内，还是城外，都有相当普遍的戏剧文化。^⑪据康熙五十年的《燕行录》记载，这时期戏剧文化普遍流行于关内各地，而辽宁地区除盛京以外几乎没有留下关于戏剧的记载，但是与关内接壤的辽西一带却有戏子屋：辽西一带“凡市镇热闹，去处多有此屋”^⑫。

第五，民居屋顶景观。永平府与辽西（广宁）两地基本上是一样的居住景观：自永平府至广宁“皆是平房子之家”，除了官家寺宇，则虽富贵之家，“无论关内外，不用夫夫之瓦”^⑬。

值得一提的是，宁远一带多出现与其他地方风格不同的民居建筑景观，即土墙与瓦屋顶相结合的民居。如叶家坟“村落店肆极盛，皆土屋，而前檐覆瓦者多”^⑭。这些民居景观实为冀东地区与辽宁地区之间的一种文化融合。该地区是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地带，虽地处东北，但仍较多地出现华北的自然、文化景观特征，甚至出现两地文化融合的现象，这使得该地区成为“渐变带”。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发现关内外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朝鲜人所描述的那么大。相反，与明时期相比，清时期两地之间文化上的差距更小，甚至在一些方面还有趋同的迹象。这与当时朝鲜人的主观感受实在是相去甚远。

四、余论

华夏对很多朝鲜人来说是一个令他们朝思暮想的地方。一向仰慕和学习“中华文化”的朝鲜，到明中期已经有了“小中华”的意识。朝鲜人总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中华文化的共

有者，甚至是唯一的不是“夷”之“夷”。山海关正是“小中华”进入“大中华”的一道大门，是朝鲜人向“蛮夷”展示其文化优越感的伟大象征。在跨入这道神圣的门槛时，有些朝鲜人甚至还发出了“还似入吾乡”^⑤的感叹。

正因深怀此种“中华情结”，清时期陆陆续续来到山海关的朝鲜人的心情很是复杂：一方面，他们本来在心理上就不认可“蛮夷”清朝，因而难免更加怀念明朝而痛恨清朝：

何年虏骑入关门，往事伤心不忍言。
大地即今殊内服，外夷从古乱中原。衣冠
尽化毡裘俗，堡垒浑成羯狗村。天寿山空
香火冷，小邦无复答皇恩。^⑥

有些人经过山海关时，讥笑清廷掌控下的山海关，如“却笑真胡城里在，不知今日更防谁”^⑦。还有些人远望山海关，哀叹“只今浑作单于宅”^⑧的现实。

另一方面，朝鲜人更加执着于山海关所应具有的功能。其中，有些人会强调其捍卫华夏的功能，时时刻刻提醒山海关“即明、清间兴亡大机关也”^⑨；还有些人则强调它的分界功能。有明一代，尽管朝鲜使臣心目中已有“辽广防胡地，幽燕壮帝州”^⑩的共识，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将辽广归于胡地夷域。但到了清时期，局势完全转变，“长城无复限藩篱”^⑪

的局面，促使朝鲜人强化了华夷分界意识。与此同时，他们更加执着于关内外的不同。清时期，朝鲜人甚至还将关内外分割成不同的空间，称关内则曰“内地”、“神州”或“中原”，称关外则曰“胡地”。因此，在他们的诗篇里常会出现“东国行人初内地”^⑫或“雄关初入见神州”^⑬等感慨。

正是受华夷分界意识的影响，朝鲜人对关内的地理、人文景观往往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宽容和肯定；相反，对关外却持着过于否定的苛刻态度。尤其是在清时期，不仅关内外的人文环境，连自然环境在朝鲜人眼里都有了正邪之别。

然而，特别有趣的是，清时期朝鲜人的关内外分界意识逐渐强化之时，恰好是这两个地方之间的文化差距缩小之时。在中原文化的辐射影响之下，关外辽西与关内永平府之间，很多地方的相似性甚至大于其差异性。此种情况的出现，笔者以为主要是清时期关外满族入关，而关内人闯关东，内外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加的结果。

明清时期朝鲜人忠实地记录下了他们的山海关意象，从中不难解读出朝鲜人的思想世界以及山海关和中原对于他们的空间上的意义。即，山海关既是强化朝鲜人的华夷思想的空间，又是强化朝鲜人的民族主义的空间。

①李宜显 《陶谷集》卷2，诗，山海关，次副使韵，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8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356页。

②崔崑 《简易集》卷6《辛巳行录》，山海关，登观海亭，载《韩国文集丛刊》第4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399页。

③许籛 《荷谷集》《朝天记·中》七月二十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438页。

④徐居正 《四佳集·诗集》卷7，第六，附次韵徐奉使用萧进士山海卫登楼诗 丘霁，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326页。

⑤韩国方面如이관성의 《홍석묘〈皇城杂咏〉小考》（载《어문논집》第58辑，2008年）一文，由《皇城杂咏》中解读出19世纪朝鲜使臣眼中的燕京形象的变化：在出使赴燕京之前，洪锡谏与其他的朝鲜士大夫一样崇尚道义、蔑视满族清朝；但是，在他亲

眼目睹了燕京繁荣发达的城市文化之后，有了迥异于前的认识与看法。又如윤경희的《金昌业燕行文学中的叫沈阳》（载《韩国语言文学》第67辑，2007年）一文，分别分析了《老稼斋燕行日记》与《燕行垣笈录》中所描述的沈阳城市意象。《燕行垣笈录》里的沈阳是苦难、耻辱的空间，是野蛮满族的根据地；而《老稼斋燕行日记》描述的则是繁荣、发达的文明城市。中国方面如杨雨蕾的《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载《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5月）。该文指出，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并不局限在中国；该词往往带有这些文人们对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文人们正是由此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另外，还有些学者注意到《燕行录》里的某些小区域意象，并由此解读出了意象背后的时代性。如葛兆光在《想象异域悲情》（载《中国文化》第22期，2006年）一文中，关注朝鲜人对燕行路上的一个小地方的执著及其象征意义，由此解读出朝鲜

人对于季文兰的想象被历史化的过程和原因。

⑥赵文命 《鹤岩集》册2诗《燕行录》山海关，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9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447页。

⑦⑮许筠 《荷谷集》《朝天记·中》七月十八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36页。

⑧郑文孚 《农圃集》卷1，五言律，山海关，载《韩国文集丛刊》第7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105页。

⑨⑳洪良浩 《耳溪集》卷7《燕云续咏》出山海关宿两水河，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4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130页。

⑩㉓金锡胄 《息庵遗稿》卷7《栲椒录》下次副使韵，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223页。

⑪赵观彬 《悔轩集》卷7《燕行诗》山海关，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1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284页。

⑫李德懋 《青庄馆全书》卷67《入燕记》下六月二十五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33页。

⑬⑯崔淑精 《逍遥斋集》卷1，诗，七言律诗，过山海关，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7页。

⑭李押 《燕行记事》，上，杂记，闻见杂记，载《燕行录选集》第六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83页。

⑰崔溥 《锦南集》卷5《漂海录》五月初六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6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491页。

⑱睦大钦 《茶山集》卷1，五言长律，登角山寺，载《韩国文集丛刊》第8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39页。

⑲⑳㉑李民成 《敬亭集》卷1，诗，登观海亭，载《韩国文集丛刊》第76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10页。

㉒⑳黄皋 《漫浪集》卷5，七言律，长城，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0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第440页。

㉓徐浩修 《燕行纪》九月十一日戊子，载《燕行录选集》第5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136页。

㉔金载瓚 《海石遗稿》卷4，诗，望海亭，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396页。

㉕正祖 《弘斋全书》卷2，春邸录二，诗，长城行，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

会，2001年，第28页。

㉖许筠 《荷谷集》《朝天记·中》七月十八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37页。

㉗麟坪大君 《燕途纪行》九月初三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20页。

㉘麟坪大君 《燕途纪行》九月十六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第30页。

㉙金景善 《燕轶直指》十二月十一日，载《燕行录选集》第10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63页。

㉚朴趾源 《燕岩集》卷12《热河日记》七月二十四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189页。

㉛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二月二十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142页。

㉜李押 《燕行记事》十二月二十日，载《燕行录选集》第6辑，第31页。

㉝洪良浩 《耳溪集》卷6诗《燕云纪行》，杏山道中，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41册，第104页。

㉞洪大容 《湛轩书·外集》卷8《燕记》，沿路记略，《韩国文集丛刊》第4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77页。

㉟崔溥 《锦南集》卷5《漂海录》六月初四日，《韩国文集丛刊》第16册，第502页。

㊱许筠 《荷谷集》《朝天记·上》六月十七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14页。

㊲金克成 《忧亭集》卷2，五言四律，宿永平府，次韵直卿，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387页。

㊳金正中 《燕行录》十二月十四日，载《燕行录选集》第6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161页。

㊴朴趾源 《燕岩集》卷11《热河日记》秋七月十一日，《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第169页。

㊵崔德中 《燕行录》三月三十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第118页。

㊶崔德中 《燕行录》十二月十八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第82页。

㊷⑳崔德中 《燕行录》十二月十九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第83页。

㊸金正中 《燕行录》十二月十五日，载《燕行录选集》第6辑，第162页。

㊹李宜显 《庚子燕行杂记》上，载《燕行录选集》第5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6页。

㊺金景善 《燕轶直指》卷1，出疆录，十二月十一

- 日，载《燕行录选集》第10辑，第66页。
- ④李德懋 《青庄馆全书》卷66《入燕记》上，五月初七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213页。
- ⑤⑥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二月二十二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第145—146页。
- ⑦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二月二十四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第150页。
- ⑧崔德中 《燕行录》二月二十四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110页。
- ⑨麟坪大君 《燕途纪行》九月十三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第28页。
- ⑩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十二月十九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第52页。
- ⑪崔溥 《锦南集》卷5《漂海录》六月初四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6册，第501页。
- ⑫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十二月十七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第48页。
- ⑬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十二月十五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第44页。
- ⑭崔德中 《燕行录》十二月二十二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85页。
- ⑮王政尧 《满族入关与清前期戏剧文化》，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
- ⑯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十二月十六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第46页。
- ⑰崔德中 《燕行录》二月二十六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第110页。
- ⑱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十二月十七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第47页。
- ⑲金诚一 《鹤峰逸稿》卷1，诗，八里站途中，山海关外。
- ⑳赵泰采 《二忧堂集》卷1，诗，永平途中，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76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11页。
- ㉑赵文命 《鹤岩集》册2诗《燕行录》，山海关，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9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447页。
- ㉒徐宗泰 《晚静堂集》卷1，诗，山海关，次息庵集中韵，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6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72页。
- ㉓朴思浩 《心田稿》二，留馆杂录，山海铁网记，载《燕行录选集》第9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67页。
- ㉔张晚 《洛西集》卷1，五言律诗，辽广途中，载《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10页。
- ㉕洪奭周 《渊泉集》卷2，诗，松杏道中怀古，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9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2年，第104页。
- ㉖申佐模 《澹人集》卷5，诗，《燕槎纪行》山海关，次简易韵二首，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09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第305页。
- ㉗申纬 《警修堂全藁》册1，《奏请行卷》九月九日澄海楼登眺，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9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2年，第15页。